

● 唐力行 主編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一期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唐力行 主编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一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一期)/唐力行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6510-8

I. 江… II. 唐… III. ①社会发展—华东地区—文集
②华东地区—地方史—文集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6851号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 一 期

唐力行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06510-8

2009年 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9年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编委会

主 编 唐力行

副主编 钱 杭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强	王卫平	王国平	王国斌	王家范	王振忠
王璩玲	井上徹	卞 利	包伟民	李伯重	李孝悌
朴元熯	朱小田	朱荫贵	白井佐知子	刘 昶	
刘石吉	池子华	许纪霖	严耀中	苏智良	巫仁恕
吴建华	陈 江	陈忠平	邹逸麟	邱澎生	邵 雍
张海英	范金民	周育民	钱 杭	徐茂明	唐力行
陶水木	章 清	曹树基	萧功秦	常建华	滨岛敦俊
熊月之	熊秉真	樊树志	戴鞍钢		

编辑部主任 徐茂明 副主任 洪煜 编辑 王健 申浩

主办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SJ0703)

稿约启事

一、《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2009年创刊，每年一期。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论、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本刊及时反映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惠赐佳作。

二、本刊以发表高水平的中途研究成果为宗旨。欢迎有关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社会史的新视野、历史评论等方面的优秀稿件。

三、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字数不限。本刊采取匿名审稿制度，对所有稿一般在收到稿件两个月内作出处理。一经刊发，奉寄稿酬。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36字)打印稿，并邮发电子版至本刊编辑部。

四、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

五、文稿请务必参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著录文章题名、姓名、工作单位、关键词、摘要、作者简介、注释、参考文献等项目。

地址：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

邮编：200234

收件人：徐茂明 洪煜

电子信箱：xumaoming@263.net hongyu1028@263.net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第一期)

理论探索

1

唐力行

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徽州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

13

陈忠平

明清江南城镇研究中理论模式的反思——以平望和乍浦为中心

33

徐茂明

明清以来士绅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以江南地区为中心

53

小 田

地域社会往昔:田野气息的吐纳——倾向于江南的案例

江南经济

72

范金氏

钱泳《履园丛话》所反映的江南社会经济

95

邢丙彦

清末民国时期松江的土地租佃费用变化

——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租佃契约文书研究之一

江南文化

111

戴景贤

戴东原论学之基本观点及其认识论立场

- 148 王璩玲
论清乾隆时期唐英剧作之“以花入雅”与其经典性建构
- 179 洪 煜
近代上海报刊与江南城市近代化——以苏州为例
- 江南社会**
- 194 权仁溶
从《茗洲吴氏家记》看明中期徽州的里甲制
- 211 王振忠
瞻彼淇奥：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
- 238 熊秉真
乾隆歙医许豫和人事初考
- 267 白井佐知子
由诉讼文书管窥徽州社会的侧影——亡夫后的寡妇的生活处境
- 297 钱 杭
萧山湘湖史上的何氏祠主复位案
- 307 池子华 李 勇
近代苏南渔民的宗教信仰
- 315 李 明 汤可可
苏州市民公社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近代基层民众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 学术评论**
- 330 唐力行 徐茂明
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以“徽州与江南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
- 347 **2007年下半年江南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徽州 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

唐力行

内容提要：研究地域社会要守住疆界，同时又必须要超越疆界，因为区域社会总是在与其环境的互动中生存发展的。超越疆界，除了要注意横向的区域集散效应圈，还应注意纵向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区域比较研究是超越疆界研究之难点。本文归纳了区域比较研究的类别，探讨了区域比较的理论与方法。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无论从理论上或是方法上都应该是多元的。深入开展区域比较研究，将使整体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关键词：区域 区域比较 方法论 整体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精英史，而是将目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而这些长期被忽略的历史要素大多是沉淀于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因此，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怎样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这就需要在一个个具体而入微的研究中进行思考。本文拟就笔者在徽州和江南研究实践中的若干思考，诸如守住疆界与超越疆界，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等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正于同好。

一、守住疆界与超越疆界

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可至一村、一镇、一县、一城,大可至一省或数省,以至一国、一洲。但是,每一个特定的区域总是有其疆界,而疆界又与区域之自然地理环境大致对应。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以山区为主,“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①。“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②。所以,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20》中说徽州疆界的特征是,“徽郡保界山谷”。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势》记述了徽州疆界的四至:“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便在这“险阻四塞”的疆界之内。多山的地理环境赋予徽州区域以特定的气候、物产、交通、经济乃至人文景观。徽州区域史研究是以该区域的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因此,举凡该区域曾经出现过的人以及因人的活动而形成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事物均属其研究范畴。举其大端,则有经济方面的商人、土地制度等;文化方面的方言、文书、教育科举、民居园林、地方戏曲等;社会方面的宗族制度、民间组织、风尚习俗、社会生活、社会分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那么,是不是我们将区域内所有的人和事一一研究过来,它们的总和就是区域整体的历史呢?显然,这是做不到的,即便能做到,也是与我们整体史的概念大异其趣的。

这里,要充分注意的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整体大于局部相加之和。因此,当我们研究区域时,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即局部)提炼出来,从局部与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以徽州而言,它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徽州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

^① 弘治《徽州府志》卷2《食货一》。

^② 方弘静:《方氏家谱序》。

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①。在经济方面,康熙《休宁县志》就徽商的兴起论说道:“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②在社会方面,则是宗族制度最为严密。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是一个避乱的理想世界,避乱是徽州移民的第一位原因。根据我对《新安名族志》的统计,中原土族向徽州的迁徙,主要发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时期。这三个时期正是中原地区战祸连天、社会动荡、北方人民南迁的三次高潮时期。而其中唐末五代移民人数最多,占54%。从移民的原因来看,不明原因的始迁约占29%,而因战乱和“爱山水清嘉”者达52.3%,占一半以上。可见,因动乱而突显的地理要素是历史上世家大族迁徙徽州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些世家大族在群山怀抱的谷地中定居下来,将古代中原地区消失了的宗族制度保存了下来。汪道昆《太函集》云:“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然而子孙能世守之,视四方最久远,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以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③在文化上,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宋代淳熙《新安志》的作者罗愿勾画了徽州文化变迁的大致走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歙风俗礼教考》中亦有相近的记载:“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在科举与理学方面,徽州又被称为“故文献国”、“朱子阙里”。

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徽商、徽州宗族与科举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中原土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

①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康熙《休宁县志》卷7《汪伟奏疏》。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1《黄氏建友于堂序》。

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入仕,正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①。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汪道昆曾精辟地指出徽州贾儒互动的关系:“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岂负困儒,则其躬行彰彰矣。”^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上述三要素构成良性循环系统。徽商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徽州科举在明清与苏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徽州宗族则是“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徽州区域社会还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语言学界将全国分为8个或10个方言区)。总之,徽州社会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阊江、青弋江又把徽州与江南联系起来,通过商人、士子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域社会能持续运行。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系统便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

区域整体史的研究,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当我们把握了区域的整体特征后,我们对区域的每个局部,就会有深刻的认识。反之,我们在对局部研究逐渐深入的情况下,也较为容易去把握整体的特征。但是,区域整体特征的揭示,绝不能以区域的疆界为限。因为,除了区域内部的互动外,区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也是揭示区域整体特征的重要方面。以上我们所揭示的徽州经济、社会、文化三要素以及它们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系统,都是超越了徽州的疆界。区域内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区域疆界外在的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外在

①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② 《太函集》卷55《浩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

的环境是指该区域的区位、对外的交通及与其相邻的区域。徽州的地理环境虽然封闭,但它的区位却是具有优势的,它位于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边缘^①,有新安江可直达杭州,借道大运河可北上苏、松、嘉、湖、常、镇、扬等江南核心地带;有青弋江北上芜湖,入长江,可东去江南,西溯九江、武汉、蜀中;有闽江入鄱阳湖,抵江西,进入去广州的商路。这一区位优势,在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中原世家大族避乱南迁,首选之地是交通便利的苏南、浙北的江南核心地区。随着江南的开发以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的蔓延,中原士族南迁的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了。在经济上,徽商的形成和强大更是得益于区位优势。万历《歙志·货殖》指出:“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徽商“出而糊其口于四方”,最为便利的就是富庶的苏杭,并最终造成江南“无徽不成镇”的局面。徽商的主干行业是国家专权的盐业。明初,盐政实行开中制,外商多为山陕商人,内商多为寓籍淮扬的山陕商与徽商。嘉靖初“西北商贾在扬者数百人”^②,势重于徽商。万历四十六年改行纲盐制后,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万历《歙志·货殖》云:“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我邑。虽秦晋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徽商之所以在竞争中力克山陕商,从而操商界之牛耳,地理上就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文化上,徽州也经历了内外的互动。徽州的原始居民是山越,其原始文化则是单一的山越文化。山越文化的特征是“鲜知礼节”,剽悍尚武。这种尚武精神与中原士族“保捍乡土”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武劲之风”。同时,士族带来的中原汉文化,渐渐使徽“俗益向文雅”。深厚的文化积累,使徽州在明清时期成为与苏州并驾齐驱的府一级的科举之乡。大量的徽州人通过科举而走向全国。文

① 我曾在《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将江南的范围定为苏南、浙北和徽州。朱小田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评论(载《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中进一步指出:“作为整体的区域空间结构,江南地理呈环形梯级分布:西边和西南边沿缘饰着山丘,有宁镇山脉、天目山、黄山、莫干山地,山体一般在700米以上;中部核心地带是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以太湖为中心,呈浅碟形,一般海拔2.5米;介于高低层级之间的是垄冈高地,从北部沿海而西而南而东,连属成环。整个江南以太湖为枢纽,上纳山地之水,倾注入太湖,下泄至东海;苏州主体位于中部水乡,而徽州位于边缘山区,苏州与徽州之间的互动便在特定区域内部生生不息地展开。”

② 康熙《重修扬州府志》卷25《閭里》。

化辐射自然是双向的。从朱熹、戴震、胡适到陶行知,从理学、反理学到科学民主,徽州文人影响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走势。徽州文人与徽商将各地的习俗风尚带回徽州,《歙事闲谭》云:“冠服采章,普天率土,悉遵时制,罔敢或异。而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持久之道,尚其知所节欤。”^①反之,他们也将徽州的宗族制度、文化心理、行为方式带到各地。例如,徽州每逢年节有演戏的风俗,戏剧更是宗族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此徽剧日渐成熟。徽商在扬州、南京、苏州等地蓄养家班。家班演戏是徽商炫耀财富、攀结权贵、洽谈商业的交际手段。《扬州画舫录》卷5提到的在扬州的七大内班中,可以完全肯定为徽商所有的就有徐尚志的老徐班,黄德、汪启源、程谦德的昆班,以及江广达的德音班和江春的春台班。由于徽商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往往自己编剧、度曲、导演,如汪注讷著有杂剧六种,潘之恒、汪季玄、吴越石等则“自为按拍协调”、“招邀导引”。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徽班进京,此后,徽剧逐渐吸取汉剧、昆腔之长,发展成为京剧,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瑰宝。又如,饮食文化中的徽菜以及徽商在扬州所发展出来的维扬菜,就占了中国八大菜系的1/4。再如徽商遍天下,徽州会馆、公所也遍天下,在全国各地城镇到处可见徽派建筑。当然徽商带去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比如徽商的商业道德、徽商刻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可以说,没有这样疆界内外的互动,就不会有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也不会有近世徽州的辉煌历史。

研究区域社会,我们要守住疆界,因为你是研究某一个特定的地域社会,而地域社会总是有其疆界的。在徽州研究的学者群体中,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或称之为徽州学,或称之为徽学。前者有明确的地域界定,后者则是模糊的,一方面与徽州学有相同的含义,另一方面则有疆界模糊的危险,因为现在就有把徽学扩大为安徽学,徽商扩大为安徽商人的倾向。这种疆界扩大的做法,实际上与区域史研究是大异其趣的。

^①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但是区域社会的研究又必须要超越疆界。胡适先生曾就他的家乡绩溪纂修县志发表过意见,他说:“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其间各都虽不各走一路,然亦有偏重,如面馆业虽起于各村,而后来成为十五都一带的专业;如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然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横港’一带亦以岭南人为独多。”^①胡适先生关于大、小绩溪的论说告诉我们,在区域史的研究中,要根据“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来确定“大绩溪”的范围。这里的“大绩溪”其实就是你研究区域的外在环境。套一句胡先生的话来说,徽州学若无大徽州,徽州学也难成局面。可见大徽州是徽州学研究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推而广之,每一个特定区域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小区域与大区域的关系。这个大区域其实就是小区域的集散效应圈。笔者在界定徽州区域的集散效应圈时就认为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三个层次互相作用,应当注意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说核心层次是小徽州的话,那么中间和外围层次可称之为大徽州。这样一来,就把徽学区域研究纳入了徽州社会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框架之内,把单一、静态、直观的研究变成了整体、动态的研究。

超越疆界,除了要注意横向的区域集散效应圈,还应注意纵向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任何区域都是在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下,因此从事区域史的研究不能从一个极端(只看中央不看地方)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地方不看中央)。前揭明清盐政的变化对徽州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便是一例。区域史研究必须要放到纵横结合的历史坐标上去。明清以来,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的冲击,因此就有必要把区域史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去考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区域的本质特征,才能把研究推向深入。

^① 《绩溪县志馆第一次报告书》,《胡适之先生致胡编纂函》。

二、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

在区域与其环境互动的研究中,区域比较是其中的一类。一般意义的区域比较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两个区域之间有直接的互动关系。比较它们的异同,区分区域发展的类型,也可以为我们探讨区域发展的特征和规律提供有益的思考。在这方面,美国尔湾加州大学的历史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①。在区域比较研究中,最具难度、最有挑战性的是两个具有互动关系的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因为研究者必须对两个区域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全面把握与深入研究。任何区域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相关区域发生人员、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与互动。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地理、物产、区位、交通、文化,乃至经济社会结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互动互补也是各区域形成并保持这些特点的的必要条件。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内涵与变迁规律,只有在区域比较中才能突显出来。因此区域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把区域研究引向深化。

在区域研究中,应该怎样超越疆界选择可资比较的区域?一般来说,两个互动的区域往往又同属于一个较大的区域,而且它们的集散效应圈是相交叉的,例如我们进行中、日两国的比较,它们都属于东亚地理圈,自古以来就有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在江南大区域的范畴内,徽州可以与众多的地域进行比较。例如江南经济文化中心的苏州,徽商“殖民地”的扬州^②等地。有鉴于此,我于1998年申报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选择苏州与徽州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与我个人的学术积累相联系的,我曾参与编纂或主编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江南区域研究论著目录(1900—2000)》等,这些学术积累使我有可能会从事这两个区域的比较研究。

① 代表作有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五石脂》云:“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徽扬互动研究之代表作有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三联书店1996年版。

进行区域比较,首先要注意两地地理区位条件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区域经济文化的异同。如前所述,徽州地处江南边缘山区。而苏州与徽州虽同在江南,其地理、区位却迥然不同。苏州东有大海,西有太湖,运河傍城而过,乃长江冲积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江南大运河开通后,优越的区位和地理条件,使苏州成为唐朝江南的雄州。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常(州)熟,天下足”^①,苏州被称为“天堂”,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中心,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徽州则由于地理闭塞、物产瘠薄,只有用当地山产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宝笔、墨、纸、砚来换取粮食,因而徽州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要之,宗族与徽商可以说是徽州的两大土产。

其次,要根据研究对象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这方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与方法可供借鉴。在进行苏州与徽州的比较时,我们从区域互动的角度出发,将区域互动划分为区域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知觉三个层面,在这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里展现区域比较的历史画卷。

第一个层面:相互沟通。如果从地图上看,苏州与徽州的直线距离仅为270余公里,应该说是相邻相近的。但两个区域的互动并不便利,因陆路交通十分困难,水路就成了两地互动的主要通道。但徽州的河流与苏州不同,苏州的河流平缓、四季盈盈,而徽州的河流湍急、季节性强,从而形成难进易出之势。生存的需要是沟通的第一要义,徽州对粮食等物资的需求与寄居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核心地带的南迁望族对避难的需求,是两地沟通的大前提。千百年来徽州商人和南迁望族不避艰难,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将徽州与苏州沟通起来。

两个区域的沟通总是双向的。但是它们之间存在一个位势的问题,即主要由某一区域流向另一区域。从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历史上苏州的发展总是比徽州要领先一步。从经济上来说,早在汉武帝时,苏州已成为“东南一都会”^②,而当时的徽州乃是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从文化上来说,《吴郡志》载,唐肃宗时,由于官绅倡导文化,苏州一改六朝之前吴人好剑尚武之俗。而徽州文化由尚武至尚文的

① 陆游:《奔牛水闸记》。

②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变化要慢一步,直至宋代才实现。两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位差,决定了两地基本的流动趋势。

从历时性的纵向线索看,两地人员的沟通可以宋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宋代之前,徽州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于苏州,但是由于其封闭的地理条件及区位,适合于躲避战乱。历史上社会动荡的乱世,北方移民多由吴地或经由吴地沿新安江进入徽州^①,给徽州带来中原及吴地的文化。可见,苏州、徽州最先的互动是由北向南互动的继续,是在江南范围内的东西向的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为逃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对徽州的经济与文化的开发,是由苏州向徽州的流动。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至民国年间,则是由徽州乡村向苏州都市的自西向东的移动。其原动力主要为经济因素。徽州商人进军江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苏州,为两地密切互动创造了条件。阊门外十里街市,是苏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是徽商麇聚之地,苏州与徽州互动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苏州与徽州两地的互动,是沿海与内地的互动、平原与山地的互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互动,这就决定了沟通的媒介主要是依靠内地、山地和落后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徽商来充任。

第二个层面:相互作用。在16—20世纪的传统社会转型期,苏州与徽州两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总趋势是:在经济上,苏州是江南的经济中心,并孕育资本主义萌芽;财力雄厚的徽商将巨额的商业资本汇聚到苏州,大大增强了苏州的活力。在社会发展上,苏州随人口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渐渐变动,承接着传统的经济优势,自发、缓慢地发生社会转型,徽商的经营活动客观上推动着苏州等地的社会转型。徽商在苏州异常活跃,获取大宗商业利润。其商业利润输回徽州,却加固着徽州宗族社会的旧秩序;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缚了社会转型。在文化上,苏州和徽州都是儒学发达之地,清代又以吴学和皖学相对峙,教育、科举昌盛,人才辈出。徽商把苏州等大都市的经济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输入徽州,使徽州社会经济发生变动;同时,徽商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带到苏州等大都市,凝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苏州定居下来。徽州、苏州两个区域的相互

^① 曹志耘:《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载《'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